

刘帅兵,支川.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工作机制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1,35(3): 83-91.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工作机制及启示

刘帅兵,支 川

(南京体育学院 武术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教育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国家是教育事业的推行者。国家对武术教育发展具有最宏观、最基本的调控,社会力量群策群力的柔性参与,能与之达到刚柔相济、琴瑟共鸣之效果。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工作中,契合了当时的政治、教育、文化等因素,同时也获得了政治、教育、文化的时代动因。在特定的时代、文化、权力、环境中,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精英、社会组织三者相辅相成形成联动机制,在推行武术教育中发挥着协同作用。给予新时代推行武术教育的启示:推行武术教育应契合政治、教育、文化等时代动因;强化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联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局面。以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武术教育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社会力量;武术教育;联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1)03-0083-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10521.004

国家在推行教育事业过程中,体现为国家教育意志的形成、实施及教育公权力的运行,这关系着教育事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方向^[1]。教育权利在学校武术教育中的实践逻辑是一种被长期忽略的客观存在^[2];社会精英借助国家意志使中国武术从民间走进学校教育并成为必修科^[3];民国以来的武术转型是将国家富强作为发展目标的国家化发展历程^[4]。上述研究表明,在武术教育发展中国行为的重要性,国家对武术教育发展具有最基本、最宏观的调控。然而,在具体实践上仅靠国家行政力量远远不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国术馆作为专门的国术推行机关^[5];学校武术的推行,还依赖地区武术运动的社会基础、当地国术团体的积极作为以及当地政府的配合等3个重要条件^[6]。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实践路径较为清晰,而深度剖析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精英、社会组织三者如何高度协同形成联动机制推行武术教育,具有现实关怀性。基于此,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的工作机制立足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文化、权力中进行探讨,为新时代武术教育治理不是

在“学校围墙内寻求方案”,而是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寻觅历史参照。

1 推行武术教育的历史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武术教育被纳入政府管理层面。武术教育的个体化被国家层面主导的集体化或群体化取代。

1.1 政治动因:配合南京国民政府治国工作

南京国民政府为谋划建构统一民族国家,强化了国家权利对社会的渗透和扩张^[7]。国家对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教育是获取人才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为此,南京国民政府竭力对教育进行控制^[8]。

学校体育自然成为向学生灌输“国民教条”的工具^[9]。“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纳入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体制中”^[10],特别是武术

收稿日期:2020-12-1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SJA0382)。

作者简介:刘帅兵(1984—),男,河南洛阳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教育与历史。

改为国术后,国家性质凸显。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与实施教育政策以提升在体育场域中的治理能力。“教育政策是国家政府与政党为解决教育当中的问题,协调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进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11]。南京国民政府为凸显在体育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于1929年颁布《国民体育法》。为贯彻《国民体育法》,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明确了教育部、各省市教育厅及行政院直辖市教育局、各县教育局等对推行国民体育的三级体育行政管理机构之权责;为讨论推行体育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教育部召集开展全国体育会议,并颁布《全国体育会议议程》;为统一全国体育行政特设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并颁布《教育部体育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为讨论及编订适合于各级学校体育课程,设立教育部委员会各级学校体育课程讨论委员会,并颁布《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各级学校体育课程讨论委员会章程》等。凡此种种,“体育教育政策制度的不断颁布、不断嵌入基层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过程。”^[12]其次,武术教育由“私有”向“公有”转向,接受制度整合。“近代以来‘一盘散沙’、缺乏整合的中国社会亟待强有力的国家主导下的组织化。”^[13]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明确提出群育,群育的提出“发扬了近代维新进步人士出于保国强种需要宣扬的‘群’的观念”^[14]。社会精英和政府试图以一种规范性的话语和制度来推行武术教育,所以武术教育由门户向团体转变,传授方式由个人向集体转变。武术从民间走向学校接受教育制度的整合,出现了从小学到大学逐级递进的课程标准。在国家意志支配下全国还进行了“国术国考”“教材编订”“课程标准制定”“师资培育”“教法改革”等系列活动。作为推行社会武术教育的体育组织,也逐渐被国术馆、公共体育场、民众教育馆等整合,这些机构以师范速成班、师范讲习班、女子国术传习所、露天国术学校等不同形式开展,推动了武术教育由私有向公有转化。最后,武术教育在政府行为和国家意志管控下推行。南京国民政府诉诸学校、社会、军队推行武术教育。以国术馆为例,各级国术馆能迅速成立且形成自上而下、层层管理的国术馆系统,与政治导向性强相关,即大多数国术馆由北洋政府时期成立的武术组织改造而来。这体现在

政府的经费支持,各省市县国术馆正馆长的设置,以及带有当时军阀和政客需求的控制成分^[15]。国术馆通过推行武术教育将国家意志和权力渗透到大众习练武术的各种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与构建中,在“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名义下,将大众本我身体升华为超我的身体,身体是国家的,“为国捐躯是道义节气最重要也最崇高的体现”^[16]。

1.2 教育动因:践行三民主义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家呈现出多个“国民政府”,蒋介石为取得思想文化主导地位只有“按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做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17]。1931年9月,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分别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实施纲要(课程、训育、设备)作出规定^[18],三民主义成为学校和社会教育贯彻和遵循的理念,是制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的依据。

首先,课程标准研制遵循三民主义理念。“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研究国术亦为救国要图,两者关系至为密切”^[19],故武术救国促使武术教育快速进入国家政治范畴,武术教育自然而然体现出一种政治意愿。教育目的也是政治意志的出发点和归宿,规定着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如在《修正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中,小学体育课程目标出现了养成“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培养勇敢、敏捷、忍耐、诚实、公正、快乐、牺牲、服务、守法、合作、互助、爱国等公民道德,以做复兴民族御侮抗敌准备”;初中高中则注重团体运动,培养公民道德;大学体育目标(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目标)规定:“通过训练把体育运用于一般生活及国防技能之中”。“南京国民政府虽标榜以解决民生为教育目标,但真正的目标在于通过学校体育教育为党、国家培养忠勇、服从、守法、守纪的顺民。”^[20]其次,武术教育积极践行三民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中,均开设有党义课程,以国术国考为例,在国术国考中将“三民主义”作为考试科目,虽然国考的目的为“选拔最高国术人才”,但在《举行第一次国考敬告民众书》中指出:“我们要做总理忠实信徒,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三民主义,就该有健全的身体;要健全的身体,就该用锻炼的工夫。要用锻炼的工夫,就该研究国术。”^[21]事实上,在当时就出现国术国

考旨在“共谋国术之发扬光大,以奠党国于永固”的言论^[22],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届国术国考中,诸多活动和仪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党化教育”“社会动员”“意识形态”的宣传载体^[23]。“国家意志掌控着整体社会的发展方向”^[21],基于“发展体育”与“强国强种”而提出推行武术教育的主张,是以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为依据,将军事、体育、武术互相为用,所以推行武术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均开设有军事、体育、武术等课程。武术教育只有契合政权的政策及其理念才能发挥社会精英所赋予的特殊意义,所以学校、军队、社会的武术教育均服务于三民主义。

1.3 文化动因:调和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歧见

民国是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交融和碰撞最激烈的时期。“如何处理和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也即从文化角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4]武术作为传统文化特质,在中西文化论战思潮中与西方体育形成鲜明对比。“国术界有许多竟未认识体育为何物,体育界有许多竟未认识国术为何物”^[25],“有人说‘国术可以包括体育’,有人说‘体育可以包括国术’,说来说去,国术是国术,体育是体育,判断是各自为政,隔着大的横沟”^[26]。

首先,对旧有武技进行改造。民国初期,武术在尚武思潮中逐渐获得契机,进行改造。1915年,中国武术被列入到学校体操科,在以操变武的思路下,“中华新武术”“精武十套”便是中国武术与体操融合的一次文化生产。这次文化生产使武术由门户私人传授向学校集体教学转变。随着中央国术馆成立,张之江为破除中国武术因“派别复杂、门户之见独深”而“各怀其宝、各藏其密”,以致不肯“公开研究”“尽量传授”,最终“递次闭减,仅余糟粕”的问题^[25],成立国术统一运动筹备委员会,着力于武术教材统一、武术名词统一、派别之沟通、武术与体育之融贯等。其次,将传统武术西化。在中西文化论战思潮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武术统称为国术,被赋予了民族主义色彩,与西方体育形成对立。经历对立冲突后,武术教育受到西方体育的影响,如“专业学校武术按照西方近代体育学理重构了传统武术”^[27],武术教学方法也在西学东渐中呈现出传统教学法、引进教学法、创造教学法等。这是中西融合的一次文化生产,为武术教育顺利进入学校体

育领域奠定基础。但是“西化”并非“同化”,传统教学方法依然有效,武术课程中的门派体系并未消解,以拳种为单位安排教学内容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相互融合。

另外,为调和中西方体育思想以及方法,特设立国立体育学校,使其“负体育上审查评议之义务”^[28]。如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南京国民政府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等,分别将武术与体育课程并列。

2 推行武术教育工作机制

2.1 南京国民政府吸纳社会精英参与

民国时期社会精英是承接国家与民众间的纽带,是国家意志的思想来源和行动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武术教育是“卫国利器”之本,对武术教育如何进行改造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意愿更是社会精英施展才华的契入点。

其一,社会精英借助“病夫”话语推崇武术教育。在种种救亡图存的方式中,武术教育能够成为卫国利器,与社会精英的介入无不相关。由“病夫”引发的诸多思考中,社会精英认识到武术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教育价值。尚武精神和强健体魄与国家建设有直接的关联,是社会精英不断论证和强化的结果,所以武术教育被社会精英赋予了培育国民尚武精神和强健体魄之重任。另外,他们在推行武术教育中拥有着管理运行、传播知识、构建主流意识等职责,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正因如此,武术机构的设置、武术政策的制定、武术出版业的盛行等,改变着封建自为的发展状态,使武术教育开始参与社会文化建构。如张之江利用人脉资源为中央国术馆的筹备、运行以及开展系列国术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借助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权力,为中央国术馆层层节制、自上而下管理提供政治支撑。其二,社会精英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在推行武术教育过程中,社会精英对传统的武术文化空间或师徒传承进行新场域、新方式的拓展。制度化的选拔体现在社会力量通过国术招生考试获得受教育权进入各级国术馆学习,国术国考为民众进入中央国术馆及地方国术馆学习提供机会。制度化选拔出的学生经过

培训学习进入多个领域工作,非制度化的任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国术馆的教员皆聘当时有一定声望的武术习练者,如王子平、高振东、李景林、马英图、孙禄堂、杨澄浦、朱国桢、韩化臣等。中央国术馆的正馆长除政府人员担任外,可由董事会推定资望相当者担任。各省市国术馆教员除呈请中央国术馆指派外,也可由各省市国术馆自行聘任国术教员,但须呈报中央国术馆备案。其三,社会精英以推行武术教育而进行合作互动。为推动武术教育变革与发展,精英之间相互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有冲突、有合作、也有分工。如鲁迅和陈铁生的论战是关于“武术是否有必要提倡”,张之江和褚民谊围绕“武术打与演”进行争辩等。中央国术馆主办的馆刊在推介武术知识、宣传武术精神等方面能在当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得益于期刊编辑各取所长的合作。“唐豪、金一明擅长史学研究,陈家轸倾注一般理论研究,姜榕樵则侧重技术方法研究,吕光华,胡异军注重古籍文献整理,陈敦正、胥以谦致力于文字宣传工作。他们精心纂修、审定之下,馆刊中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武术史学、一般理论、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29]梁启超、范源濂、马良、徐一冰、张之江、唐豪、许禹生、吴志青等,他们将中国武术与时代命题相关联,通过改造传授方式、拓展传承途径、顶层设计、科学研究等拉开了武术教育现代化的序幕^[30]。

2.2 南京国民政府诉诸行政力量推行

蒋介石认为提倡国术之本义“小可保障家身,大可捍卫种族”^[31],唐克南认为国术与中国的关系“如身灵之相依,皮毛之相附,桴鼓之相合,不可分而离也”^[32]。陈家轸认为“欲图国术之发扬光大及门派之融通化合,非教育不为功也”^[33]。种种话语使武术国家化,成为国之大事。

其一,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中制定政策以强化国家行为。以教育部颁布的政策为例,1932年,《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武术在内的体育课程,每周2小时,不及格不得毕业或升学,武术教材由体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撰(该会由教育部体育委员会设置),各地区设立体育团体^[34]。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的颁布促进了全国学校武术课程标准、教材标准、教材大纲的研制,如教育部颁布《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指出武术教材大纲为:

《少林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刀术》《棍术》《枪术》《剑术》《弹丸》《摔跤》《搏击》(女生不含《摔跤》)^[35]。各地设置体育团体以推行社会武术教育,如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指出:民众教育馆隶属国家行政机构,其中健康部设置有武术内容;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针》指出:“国民体育之实施,应列为重要施政纲要之一”;同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推行武术:“通令各省转飭各县教育行政机关及各中小学校一体遵照办理”^[36];1941年9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布《修正国民体育法》中指出:“教育部主管全国体育行政”“国民体育实施之经费,应列入各级政府预算”^[37]。系列政策的颁布彰显着发展武术是国家在场的行为。

其二,地方政府积极制定办法以配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工作。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中,地方政府积极规划推行武术教育的办法。如陈泮岭在《发展河南国术计划》中指出:发展计划从组织、宣传、训练、研究、鼓励等5个方面进行,其中训练方面包括“恢复国术训练班、加紧武力团体国术训练、加紧各级学校各机关及一般民众开设国术训练班”^[38]。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提倡国术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湖北省《修正湖北省提倡国术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各县训练人民国术办法》等也随之颁布。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令通令各省民政厅注重推行武术,并制定“各省民政厅市政府公安局等训练国术办法”^[39]。

其三,各地教育局详细制定推行武术教育的工作计划。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教育局和中央国术馆联合制定中小学武术教育推行计划:小学高级部及中等学校将武术列为必修科(中学武术每周150 min,小学每周120 min),武术教师和教材由中央国术馆委派和编订,市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全市学生均须表演一次^[40]。南京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局在“推广学校国术训练暂行办法”中指出:“推行学校武术教育以‘区’为单位,各区武术教师由青岛市教育局函请青岛市国术馆推荐并由教育局委派,武术教材由国术馆编订,武术教师的考核由教育局和国术馆分期考察。”^[41]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局分别颁布《青岛市小学三四年级国术课程表》《青岛市女子中学初级高级国术课程表》《青岛市男

子中学初级高级国术课程表》。南京国民政府北平市社会局根据教育部在1932年颁布的“小学体育音乐等课程标准”基础上,结合北平市的特殊情况而制定“小学体育具体课程”,对于武术课程主要涉及教学目标,课程的时数、内容以及教材说明。其中,教材内容选用《太极操》《太极拳单式》《少林十二式》《岳氏连拳》《新武术》《十三剑》等^[42]。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以行政力量且颁布法令规程来推行武术教育,但各省市地方推行武术教育成效参差不齐,“可幸的是,此时期的学校体育均在国术教育之推行已有极大的成长。”^[43]

2.3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社会组织开展

南京国民政府对旧有体育组织进行改善和统一,使旧有组织由自由分散走上统一管理。除独立推行武术教育外,还联合其他单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推行速度和效果。

其一,国术馆自上而下、层层节制。国术馆按照组织结构分中央、省、市、县国术馆以及区、村、里国术社,而下级受到上级管辖和领导。中央国术馆对地方国术馆推行武术教育常常派馆员督促检查,并将其培养的优秀学员输送到各地协助地方国术馆的建设与组织工作。各级国术馆作为主要推行武术教育的实践单位,负责各地区的学校武术和社会武术教育工作。中央国术馆还专门制定武术教育推行计划:“①成立首都中小学国术教育推行委员会;②由中央国术馆编定学校适用国术教材,委派专家实地教练;③将首都中小学依原有学区划分为若干教育范围,每届月终,集合全区学生,公开表演一次。”^[44]中央国术馆负责全国武术教育推行事宜,各地方国术馆负责该地区武术教育推行事宜。

国术馆除单独推行武术教育外,还联合其他单位推行工作。如前文所述中央国术馆和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教育局进行协同成立“首都中小学国术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制定“推行办法九项”。南京国民政府青岛市国术馆组织专家编制《青岛市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还协同建设办事处推行武术教育,其办法为:“①凡乡区建设办事处每处由国术馆选派国术指导员一人或两人常川驻处秉承办事处主任之命负责推进及教练国术事宜;②乡村各小学由各办事处就地势之便利划分为若干区,每区若干校设国术教员一人;③乡区每村人口满二百户以上者应设

国术练习所一处,其所长由办事处选派当地村长或首事充任之;④各区内原成立之国术练习所应由办事处督促进行,如有应行变更或取缔事项得会通国术馆处理之。”^[45]

其二,公共体育场自上而下,形式多样。公共体育场是一种提倡社会体育,以“指导民众发展体育及从事正当娱乐”为宗旨,让民众能够达到体育运动为目的的场所^[46]。公共体育场的一些事务均受主管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主要分国立、省立、市立、县立以及学校体育场和工场附设的体育场等。“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其下设的体育委员会为主导,通过教育行政体系自上而下,有利于体育场的建设和管理,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体育场建设与管理所需的资金”^[47]。还出现了建设公共体育场的指导性书籍,其中对于“国术室设备”规定:“①国术中所有武器,如单刀、双刀、大刀、枪、棍、剑、钩、摔角衣、拳斗手套等皆为必备之器具。②垫褥,长为八尺、宽为四尺、厚为三尺。外包帆布,中实竹花或棕缕等弹性之物”^[48]。

在公共体育场的6个运动项目中武术作为其中之一,他们多以设置国术研究会、组织国术训练班、举办国术表演的形式对民众推行武术教育。特别是省立级别的体育场,除推行武术教育外还承担着体育调研和学术推广等职责^[47]。如南京国民政府福建省立公共体育场,举办了国术训练班,训练分3期,每期3个月。中央体育场的国术场举办了武术表演和武术竞赛;南京国民政府江苏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创办《体育研究与通讯》刊物。公共体育场除独立推行武术教育外还联合学校或工厂等,二者联合可以实现体育场的互用以及缓解二者经费紧张和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与公共体育场共用,学校体育教师兼任公共体育场场长及指导员无疑是一个较好的现实选择”^[49]。

其三,民众教育馆自上而下,层层联合。民众教育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动建立以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为宗旨,实现各种社会教育事业的机构。它作为各地社会教育系统的中心机构,领导和统筹其他民众教育机构,“汇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音乐厅等各种社会教育事业,采取组织参观、阅读报刊、看戏、办壁报、讲演等多种方式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50]。民众教育馆分省、市、县等,其各自隶属于省市县教

育厅局。民众教育馆凭借着国家赋予的“中心”地位,将推行武术教育作为职责之一。

各省市县的民众教育馆附设有武术组织进行推行武术教育。如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国术研究会,其宗旨为“发扬国术,讲求自卫,增进民众健康”,凡年满12周岁,“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者均可入会,并聘请国术馆人员担任教师^[51]。南京国民政府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组织的国术研究会,以提倡武术教育增进民众武术技能为宗旨。该会学科为太极拳及其推手枪刀剑5门,每期3个月。不分性别年龄及资格,凡热心参加者一律可加入^[52]。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的国术馆、公共体育场、民众教育馆等,三者之间经常进行合作与联系,如公共体育场的武术教员则有国术馆培养和委派,中央国术馆的两次国考也借助南京的公共体育场进行。由于国术馆、公共体育场、民众教育馆的功能大多类似,所以他们之间经常进行合并,如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陕西省的平民教育委员会从中山图书馆分离出来与平民图书馆、天文台、公共体育场等机构合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陕西民众教育馆”^[53]。1935年前后,部分县级以上国术馆曾并入民众教育馆统一管理^[54]。体育组织虽然自上而下、逐级管控,自成体系的推行武术教育,但是层层联合的协同化使武术教育得以顺遂推行。

3 启示

3.1 推行武术教育以契合政治、教育、文化等时代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过程中,紧紧贴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教育等社会背景和时代诉求,反之,政治、文化、教育也成为推行武术教育的历史动因。不管是配合南京国民政府治国工作还是践行三民主义抑或是调和中西体育之歧见,其历史意义是有效和深远的,对新时代武术教育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

其一,推行武术教育应服务于体育强国则中国强的战略目标。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55]武术教育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一部

分,具有重要的群众基础、竞技基础、产业基础、文化基础等,所以在推行武术教育过程中着重在全民健身、竞技武术、武术产业、武术文化等方面,并深度挖掘武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逐步形成武术运动生活化的社会风气。其二,积极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武术教育的“育体”与“立德”的价值和功能。通过显性的育体指向隐形的立德。显性的育体,如套路育体的过程性、格斗育体的对抗性、功法育体的静心宁神等,使身体呈现“行如风”“坐如钟”“站如松”等形态。隐形的立德使受教育者践行“求真”的原则、追求“向善”的价值、领悟“尚美”的境界^[56]。通过外化于行内化于心,最终实现“武以成人”。其三,深化武术教育内涵,增强文化自信。武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特质,深化武术文化内涵、增强文化自信,既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促进个体身体健康。然而,中西文化的歧见、近代以来的西化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语境中,应深化武术文化内涵,使中国武术走出被“体育”禁锢的“牢笼”,释放其博大精深的内在力量,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7]。守正与创新是处理中国武术面对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等问题的辩证统一,唯有如此,中国武术才能复归文化自信的历史传统。

武术教育只有契合时代的主流价值和动因才能获得发展先机并发挥最大价值,故此,新时代武术教育的发展,应助力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积极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深化武术教育的内涵,增强文化自信。

3.2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局面

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将“武术”改为“国术”,在强化民间武术与国家的联系中逐步实现国家化。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系列政策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建设,自上而下、上传下达,虽有些政策并未有效落实,但整体上颇有成效。不管是国家的顶层设计,还是微观的组织践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根本保证。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过程中,为避免行政化带来的障碍,利用社会力量具有灵活机动性、技能全面性、群策群力性等特征和优势对推行武术教育进行宣传、研究等。但是社会力量具有的柔性特征,无法达到与政府颁布的政策制度来

推行武术教育的刚性效果。

其一,政府要立法建规,进行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保障。立法建规的顶层设计是推行武术教育的根本保障。^①师资配足。武术师资力量力量的匮乏一直是推行武术教育的障碍。不管是专业武术教育还是非专业武术教育,师资作为武术教育的主导力量,是教育的实施者和知识传播者。所以武术师资的配备需要国家颁布相关指令,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配足武术教师,上足武术课程。^②教材特色。中国武术的拳种体系呈现出渊源有序、风格迥异以及特色鲜明的特性与地域文化特色、环境风貌、宗教信仰等有着直接关联。为避免中国武术同质化,武术教育的教材理应呈现出国家统编、地方特色、校本自选等三级武术教材。这须由政府统一谋划方可实现。其二,社会力量要协同化参与武术教育推行工作。^①在师资配足方面除了国家颁布相关指令外,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化至关重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些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聘请校外能够担任武术教育改革任务的师资力量,可以外包,也可以同校外师资力量共同建设学校的武术教学活动。”^[58]^②在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一校一拳”的教改理念背景中,如何在国家统编教材、地方特色教材和校本自选教材中留有余地撷取地方拳种,积极发挥社会力量优势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拳种的选取应考虑到地方拳种的群众基础和地方特色,在对某一拳种进行创编教材过程中还应遵循阶段性和系统性原则。特别是在筛选地域武术和族群武术拳种过程中,只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才能完成。

另外,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局面中,强化官方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联合。如加强官方(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与社会组织(各级武术协会、各地方武术组织)之间的联动性。邱丕相认为:“展望未来,武术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管理模式必将从一味由官方操办和家族自由经营中走出来。”^[59]总而言之,推行武术教育只有立足于国家战略并得到国家行为支持,才能获得先机,借助社会力量的优势,使“刚”与“柔”并进,相辅相成。

3.3 强化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的联动

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中,对于师资的选拔采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形式进行,特别是

中央国术馆为解决师资匮乏,聘请一些武术习练者充当武术教员。在推行武术教育过程所颁布的政策制度中,不乏武术习练者参与其中。近些年武术教育出现学院派和民间派两种类型,整体上认为学院派注重理论,民间派注重实战,暂且不论二者是否真正注重理论或注重实战,但在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下,武术教师和民间拳师的沟壑难以消除。

其一,走出去,到民间采风。真正的武术在民间。近些年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不再从概念走向概念,而是从概念走向田野,运用大量生动的材料去探寻何为武术文化真义等相关议题。学校也逐渐开设传统武术课程。故学校与民间拳师建立联系,学生可定期到民间学习传统武术,这不仅体验传统武术的训练方法,更能感受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教师也要放下姿态积极走进民间,“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丰富性为身处不同地域的武术教师到民间汲取营养提供可能。学校武术教师应设法去亲近它,主动与民间师傅交流并虚心向他们请教,采集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长善救失,改进自己的教学。”^[60]当然,民间拳师良莠不齐,武术教师须加强文化辨识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二,请进来,给予民间武术传承者参与的权力。民间武术传承者作为社会武术教育的推行者,其贡献不可磨灭。正因为他们的坚守,中国武术才不至于断裂和消逝。随着“一校一拳”教改理念的确立,许多学校开始引进较具地方特色的拳种。如作为河南省三大拳种之一的“苌家拳”,其传承人被外聘到黄河科技学院传授苌家拳,河南理工大学也将太极拳作为学校特色定期聘请民间拳师走进讲堂。学校虽是官方主导但给予了民间武术传承者走进讲堂的机会,且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所以重视民间武术传承者并赋予其参与的权力,“聘请当地民间武术家作为师资,按照资历、授课效果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在此基础上,由当地体育、教育主管部门配合当地部分体育教师进行试点培训,选取更多的学校进行试点。”^[61]通过反复试验,可以找出更为合理的模式。

依据“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建立学校与民间的互动,一方面,积极鼓励引导武术教师和学生到民间向拳师学习和交流;另一方面,将“德艺双修”的民间拳师请进课堂为教师和学生开展讲座。如此,

民间武术传承者才有一定推行武术教育的参与权,从而发挥民间武术传承者的群策群力。

4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将武术教育纳入国家政府管理层面,其推行动因政治上以配合政府治国工作,教育上进行国家意志的渗透即践行三民主义精神,文化上调和“土洋之争”的中西体育文化歧见。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贴合了政治、教育、文化等3大因素,也因此获得了时代动因。在推行机制中,社会精英、政策制度、体育组织成为运转武术教育的核心因素,三者之间相合协同是推行武术教育的保障。概言之,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武术教育中,通过社会精英将国家意志诉诸政策制度进行展露,体育组织成为国家意志践行的实体支撑。以往研究多从政策制度、社会精英、体育组织中选取单个进行,忽视了民国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协同性,不能呈现推行武术教育所需的合力。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的启示:①推行武术教育以契合政治、教育、文化等时代动因;②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局面;③强化民间武术与学校武术的联动。新时代武术教育的发展如何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教育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度的创造性转化,即深描和构建新时代武术教育推行机制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 [1] 王有升.国家教育意志与教育公权力的运行体制分析——对国家与教育关系的一种理论探讨[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89-95.
- [2] 王晓晨,乔媛媛,张峰.百年学校武术发展中的教育权利实践及其新时代走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3): 361-366.
- [3] 刘帅兵.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7,37(10): 32-40.
- [4] 周延,戴国斌.武术国家化:民国时期武术转型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0(1): 73-79.
- [5] 王小磊.南京国民政府国术推行工作述略[J].体育科研,2017,38(5): 83-88.
- [6] 吕思泓.民国时期学校武术考论[J].中国体育科技,2016,52(1): 16-2.
- [7] 宫炳成.控制与建设:南京国民政府社团与民众政策的双重取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6(3): 123-130.
- [8] 曲铁华,慈玲玲.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路径与内在逻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

- 12(5): 4-53.
- [9] 白雪松,章深.近代“国立”高校体育课的建立和变迁[J].深圳社会科学,2019(6): 105-111.
- [10] 王广虎,冉学东.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心路历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44(6): 34-43.
- [11] 苏国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教育政策的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12] 陆小聪,吴永金.体育与民情: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近代中国体育进程的再思考——兼论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反思[J].体育科学,2016,36(9): 3-9.
- [13] 张虎祥,仇立平.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三大逻辑[J].探索与争鸣,2016(10): 57-63.
- [14] 向春.近现代群育观念的复兴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08,6(1): 30-67.
- [15] 蔡宝忠.对近代中国武术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重新思考[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6): 494-500.
- [16] 李佳芯.近现代国家权力下的修身教育——基于家训与修身教科书的文本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5(3): 89-101.
- [17] 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M].台北:文化大学出版社.
- [18] 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J].教育部公报,1931,3(38): 48-68.
- [19] 蒋中正.提倡国术之本义[J].中央国术旬刊,1929: 8-383.
- [20] 王芳.南京国民政府中小学体育教育目标探微[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29(2): 99-103.
- [21] 举行第一次国考敬告民众书[J].第一次国考特刊,1928: 26-29.
- [22] 中央国术馆举行第一次国考敬告民众书国术馆使命在于造成强健的民众作革命建设的基础国考之目的再谋国术之发扬光大以奠党国于永固[J].广西教育,1928,1(2): 46-47.
- [23] 徐诚堂.第二届国术国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11): 180-183.
- [24] 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5] 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
- [26] 刘慎旃.体育救国论[J].勤奋体育月报,1935,2(8/11): 519-522,713-719.
- [27] 李兆旭.传统体育项目的近代学科建设——民国时期专业学校武术研究[J].体育学刊,2020,27(3): 90-95.
- [28] 体育研究社提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设国立体育学校案[J].体育丛刊(专件),1924: 3-4.
- [29] 吉灿忠,纪明霞,郭强.中央国术馆馆刊及其社会功能[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3(2): 11.
- [30] 刘帅兵,赵光圣.民国时期社会精英推行武术教育工作述略[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9,19(1): 67-72.
- [31] 蒋中正.发起提倡国术之本义[J].中央国术旬刊,1929(4): 1-2.
- [32] 唐克南.国术与中国[J].中央国术旬刊,1929(3): 5.
- [33] 陈家骥.中央国术馆工作之报告[J].中央国术旬刊,1929

- (8): 3-5.
- [34] 规程:国民体育实施方案[J].教育季刊,1933,1(4): 226-239.
- [35] 国内外教育新闻:教部令发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J].教育季刊(上海1925),1936,12(4): 69-70.
- [36] 教育部消息:教育部通令普遍推行国术[J].进修,1941,3(7-8): 9.
- [37] 修正国民体育法[J].社会部公报,1941,(3): 10-11.
- [38] 陈泮岭.发展河南国术计划[J].河南政治,1932,2(12): 1-7.
- [39] 国民政府内部令(第二六三号)[J].内政公报,1928,1(2): 76-78.
- [40] 首都中小学国术教练定期施行:拟定办法九项[J].河南教育行政周刊,1931,1(30): 23-24.
- [41] 青岛市教育局推广学校国术训练暂行办法[J].青岛教育,1936,4(5): 13.
- [42] 小学体育具体课程:国术[J].时代教育(北平),1935,3(4): 177-253.
- [43] 郭宪伟.近代中国国术的教育政策推行与意义[J].中华体育季刊,2019,33(1): 41-51.
- [44] 中央国术馆推行国术教育[J].湖北教育厅公报,1931,2(8): 175.
- [45] 青岛市国术馆协同建设办事处推行国术办法大纲[J].青岛市政府公报,1936(72): 221.
- [46] 公共体育场(问答)[J].立言画刊,1939(50): 34.
- [47] 梁松尚.民国时期的体育场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8(8): 178-181.
- [48] 孙和宾.怎样办理公共体育场[M].南京:南京书店,1933.
- [49] 陈锐.民国时期公共体育场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 [50] 黄书光.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 [51]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附设国术研究会简则[J].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2,3(7): 181-182.
- [52] 苏京民教馆组织国术研究会:推广国术发扬国光,提倡体育锻炼身体魄[J].教育与民众,1931,3(3): 609-610.
- [53] 张礼智.劝工陈列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源头[N].中国文物报,2018-9-21(3).
- [54] 陈长河.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J].历史档案,2009(3): 108-113.
- [55] 国办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9-3(2).
- [56] 王岗,韩金清,侯连奎.中国武术“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求真向善尚美[J].体育学刊,2018,25(6): 1-6.
- [57] 王岗,赵连文,朱雄.“再发现”与“再出发”: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反思[J].体育学研究,2019,2(2): 6-14.
- [58] 吉洪林,张峰.武术教育改革的实践困局与破解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6): 68-72.
- [59] 邱丕相,王震.中国武术的回眸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18,1(3): 55-60.
- [60] 刘文武.传统武术进入我国学校系统的必要性及其途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1): 97-101.
- [61] 侯胜川,林立.民间武术家与中、小学武术教育融合路径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7,35(5): 19-25.

The Mechanism of Wushu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Shuaibing, ZHI Chuan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School of wushu and Arts,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oun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is the promoter of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martial arts education, the country has the most macroscopic and basic control, and the masses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and exerting their strength of social forces can work supplementarily well with government regula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wushu arts educati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greed with th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t that time, and obtained the natural results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a specific time, culture, power and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social elit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form a linkage mechanism, which plays a synergistic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tial arts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wushu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re as follows: Wushu education should be in accord with political,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o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tim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ors of folk martial arts and give them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We will build a new situation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takes the lead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encourag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whole society participate in the martial arts education in the new governance pattern.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ocial forces; wushu education; linkage mechanism